

从“吉光片羽——习之堂藏学术资料卡片展”谈起

周春健:读书抄书,生活日常



▲卡片形制不一,或专门印刷,或就地取材,皆以短小便携为特点。卡片之书写制作,既是一种阅读方式,又是一种写作方式。

▲王利器“古籍校勘资料卡片”,“吉光片羽——习之堂藏学术资料卡片展”展品。

1 书写卡片是本分功夫

周春健,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,习之堂儒学馆创办者,学术策展人。从“百年讲义展”“百年家书展”“百年弦歌展”到“东亚汉文书写展”“延安文艺讲话文献展”“木刻雕版特展”,直至如今的“学术资料卡片展”,2019年至今,习之堂在锡昌堂举办的七场高水平学术展览,已渐凝聚出“格物育人”的系统、全局性内容指征。

何为“格物育人”?

用最先提出这四字概括的中大哲学系教授梁庆寅的话来说,结合展览,就是回到历史现场,唤起历史记忆、吸纳优秀传统、拥抱现代生活。这里,学术资料卡片承载的,是扎扎实实整理、踏踏实实治学的本分功夫。

“这种精神,即使在科技进步的当下和未来,也永不过时。”

周春健这样看待学术资料卡片,他说:“古人读书,遇有心得处,每随手记于书册天头,是谓眉批;又多抄录书中名言警句或重要资料,排比研析而成著述或钞纂之作。古之学者为己,读书治学之方式,大抵如此。近世以来,随着纸张之改进及书写之便捷,文人学士多将读书过程中心得感悟或相关资料手录为卡片,以便检寻利用。卡片之形制不一,或专门印刷,或就地取材,皆以短小便携为特点。卡片之书写制作,既是一种阅读方式,又是一种写作方式。”

进入书本,把书读薄、凝练字句成为卡片,而卡片的书写和系列排布、整理,则体现出阅读者学术甄别、把握大义的能力,也有助于其集腋成裘、锲而不舍精神的时刻锻造,更甚者,笔记卡片是另一轮杰出创作的开端。

展览中,著名国学专家、致力于文化遗产整理工作的王利器先生(1912-1998),手书的一沓沓如小小丘陵般、布满展柜的“古籍校勘资料卡片”,就如同他思想中不断攻克堡垒以及延展开拓的更大疆域。“王先生正是通过这些看似零散的资料卡片,最终形成了一部部传世著作。”



2 读有所获,指真正理解 真正理解,须合乎逻辑合乎学术

据了解,王利器先生当年述说他的读书方法主要有二:“单刀直入”和“双管齐下”。“单刀直入”指阅读重要书籍时,把一本书反复从头到尾研读,直至弄通吃透,比如他读《吕氏春秋》《盐铁论》;“双管齐下”指在除重点读一本书外,再结合相近的书阅读,例如研读《文心雕龙》兼读《文镜秘府论》、研读《水浒》兼读《红楼梦》,而它们围绕同一中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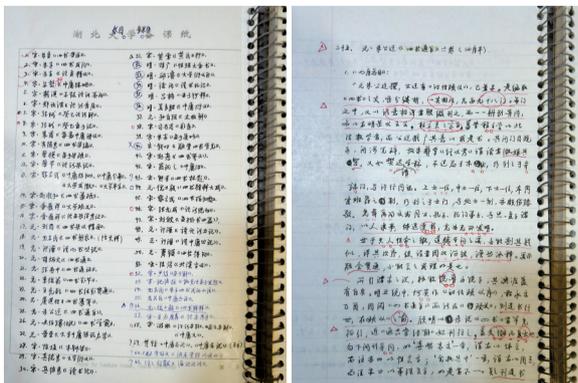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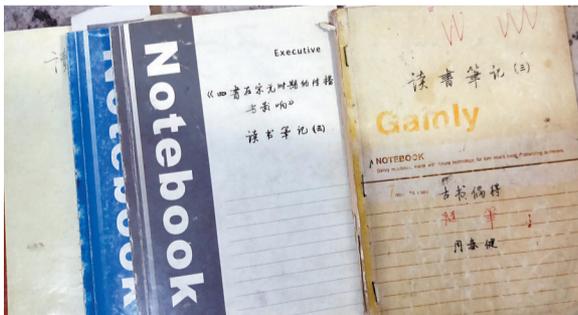
周春健也回顾了他当年历时两年半攻克博士论文,并最终成书《元代四书学研究》的难忘时光。“至今回想,我仍对那段时期的心无旁骛、制心一处无比怀念,并感慨这种状态何日复来。当时用了两年时间查阅、整理资料,以作前期积累,最后在整整100天内,写就30多万字。

“在攻读阶段,有些需要通读,于我而言,所有与元代四书学相关的著述,应找尽找,然后把重要内容、例证逐一摘抄。包括相关零星信息的搜罗。另一重要方面,就是纵览与元史相关的正史(辽史、金史、元史等)以及与元代四书学相关的、与思想文化史相关的书籍。当时我的读书笔记和卡片有数十册,而当时书写、记录的工整字迹,现在看起来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。”

周春健说,在那次的论文撰写中,他有两点深刻体会,其一是理论研究要以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占有为基础,否则结论便不真实,“本着这一指导思想,我首先完成了一个几乎与正文规模相埒的《元代四书类著述考》,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全文论述。虽称‘附录’,其实是正文不可分割的部分”。

他的第二个深刻体会就是应打破学术壁垒,于各学科营养兼收并蓄。“我硕士读的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,长期从事微观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。而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感受到,一个学术问题的最终解决,需要微观和宏观的结合,缺一不可。于是我大量阅读了哲学史、思想文化史方面的书籍。”

也因为这本《元代四书学研究》,周春健从此与中山大学哲学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感昔观今,他强调,所谓“读有所获”,最重要的是落到“理解”这两个字上。所谓理解,就是能把书中理论脉络梳理清楚,准确提炼,并能用自己的语言,合乎逻辑、合乎学术地再次呈现。“而在这一过程中,我们的读书笔记、读书卡片,承担着重要功能。”



■周春健作于约20年前的读书笔记。

3 “静”与“读” 让生活更美好

最后,延续对上述写论文时“专致时光”的怀念,周春健提到,“静”与“读”让生活更美好。

他回忆了刚过去的令人难忘的两三年,其中的一个春节,非常时期只能闭门不出,“因当时的居住地并无多少专业书籍,无法撰写学术论文,于是充分利用这段相对集中的时间,读书抄书,竟完成十二种手稿‘成果’,着实有点出乎意料”。

其中,既包括抄书类,如《史记叙录钞》一册(抄录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为每篇所作提要)、《汉书叙传钞》一册(抄录《汉书·叙传下》为每篇所作提要)等;也有编著类,如《钱宾四国史大纲讲记》二册、《中国文学史讲记》一册(均为其女儿授课所编);此外还有“游艺类”,如《故宫博物院藏宋人小品》题跋30种、《上海图书馆出版社历代名画》题跋15种等。

他说:“其间曾花十天时间通读《史记》全文,获益良多!从中也发现了诸多今后可以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。倘若不是此次特殊因缘,或许一直无法完成这项工作。一个余月,自己虽然未曾写出一篇学术论文,却为未来能出更多成果打下基础。而且拿起笔来抄录文字的过程中,更能深刻体会到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伟大之处,这实在是一种奇妙的体验!四十余日,又为小女讲授《国史大纲》20讲、《中国文学史》8讲、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》7讲,教学相长,自己在授课过程中也得以温故知新。”

“这一经历提醒我们,非但在当时那一特殊时期,哪怕是在未来的日常生活中,我们也都需要在每天至少是每周,腾出一定时间读读书、抄抄书,与家人多多交流,这既会使我们的知识积蓄更加丰厚,也会使我们生活质量大大提高,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”

“读书抄书”,他最后说道,“希望这些,都能成为我们的生活日常。”